



# 语言,沟通不同文化语境的桥梁

本报记者 司晋丽

■访谈

## 在语言的交流碰撞中增进文明互鉴与融通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

本报记者 司晋丽

记者:我们了解每一种文化,都是从语言文字开始。您第一次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哪一部?从中体味到不同文明有何交汇之处?

陈众议:文学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审美和价值影响无可取代。我读到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应该是《一千零一夜》,它是阿拉伯文学经典,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经典。首先,它是无数部名著的汇集,散为万珠,聚则一贯,让我想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故事,如《搜神记》《幽冥录》等。其次,它既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的共同创造,也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希腊人的共同创造。“一千”是许多,加“一”是许多“+”,是无穷无尽。每个古代创造者都不知道自己是这部巨著中的一分子,但每个近现代文学家都无意地在延续山鲁佐德的故事,我自己也一样,譬如新近出版的《如是我闻》。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人就很有灵性,我们又何尝不是那个阿拉丁?魔法师可以听见阿拉丁在中国的脚步声,而我们正是道高一丈、决计戳穿魔法的读者和写作者。在那些神魔鬼道、冒险故事的背后,都蕴藏着源自远古的人类集体无意识。时至今日,它们还在对我们的想象产生作用。除了《一千零一夜》,几乎同时进入我视阈的还有《安徒生童话》《堂吉珂德》等许多名著。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倘使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这一触及文学本质之问应该成为常识。当然,遗憾的是阿瑞提不知道《红楼梦》,较之于哈姆雷特这个丹麦王子的传奇,《红楼梦》才是更好的个例。如果没有满汉、南北文化的交融,如果没有道家中庸、繁华泡影的这一个曹雪芹,那么这世界是断然不可能有《红楼梦》这样一部旷世巨制的。今天受电子产品和西方思潮的裹挟,不少年轻朋友将《红楼梦》等中华名著视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殊不知中文之美在文学,文学之美美在中文,而中文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记者: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1978年第一次走出国门,是怎样克服语言障碍的?

陈众议:我是带着憧憬和决心、敬畏和憧憬离开祖国的,抵达北美大陆后首先遭遇的便是语言问题,于是买了一台砖头式录音机随身携带,反复查字典温习功课。那是一段较为艰难的时光,但沉重的抱负和坚韧的决心让我很快从只能听懂零散的单词慢慢进入状态,开始了有意找外国同学交流、用肢体语言和夹生洋文表达的阶段。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将近一年。而潜入一种文明的最好方法一定是阅读其经典作品,由浅入深,持之以恒。我记得当时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和方法正大行其道,但所幸坚持传统方法和文学经典的依然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外国教授仍致力于用风格、修辞、审美价值、知识考古和社会历史批评等传统方法阐释经典。当然,文学作为人类情感、心性和族群、民族、阶级、国家、区域社会历史、审美传统的鉴镜和表征,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一览无余的,需要长期的阅读、思考和辨析。同理,对我们自己的文学经典也是如此,无论《红楼梦》还是唐诗宋词、楚辞汉赋等等,都是常读常新的。会心之处、动情之时,它们都是古今对话的最佳平台。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借助钱锺书、杨绛、冯至等大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写作和翻译工作,国内读者打开一扇扇看世界的窗户,也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杨绛先生曾用“一仆二主”说来诠释译者的使命,令人充分感知到其中艰辛。您怎样看待这些“大先生”们在增进中外文明互鉴中所作的贡献?

陈众议: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同钱锺书、杨绛、冯至,以及他们的学生许渊冲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作家有过交往和交集。去年,在纪念许渊冲先生百年华诞之际,我作过致辞,除了历数许渊冲先生在中译外、外译中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还列举了他年轻时对“三民主义”的译法:“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并在毕生的翻译实践中提出了“三美论”和“三化论”。这些思想既有对钱锺书先生的“化境”说和杨绛的“一仆二主”说的继承,也有他基于实践的创造性发挥。至于冯至先生,他不仅受到过鲁迅的褒奖,被称为“最优秀的抒情诗人”,而且凭借《杜甫传》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钱锺书先生更是在古今交融、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既反对盲目的文化自信与自卑,又横扫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与傲慢。习近平总书记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其中还提到了钱锺书先生。

记者:现在,每天依旧有源源不断的外国小说、诗歌等作品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中国作品、中国故事也在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但总体上还是外译中多一些。在对外传播中,怎样才能形成与现阶段中国发展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陈众议: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外文化交流日趋深入。不过,如何平等对话、中外互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拿文学来说,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首先有赖于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无论是19世纪的英法文学,还是20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走向世界都倚赖其背后强大的国力。同时,话语权之争确实不能等。我们要注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主动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华文化的许多重要元素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譬如和平思想、大同理念。钱锺书先生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同样,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反之,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的辽金蒙满有多少曾经的“异邦”,一俟融入中华文化,便再没有侵略、压迫和奴役其他国度。故言三大殿——太和殿乃天人之和,中和殿乃人己之和,保和殿乃人己之和,便是对中华文化的高度概括。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持续倡导全民阅读,同时加大经典在中学和高考的权重。后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外语教学也不能偏废,我国是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自强不息,必定也还需要有心有圆,求包容、致中和,道器平衡、内外融通。

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今后探究和改进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

“在向普通民众说明中国方面,我们的对外传播还有待加强和改进。《人民中国》也经历过不断调整的过程,以前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讲道理,可读者并不接受,后来并不刻意讲道理,而是讲故事,这样效果反而好,在日本形成了固定的读者群。”王众一告诉记者。

多年前,《人民中国》曾开设了“十三亿人的生活革命”专栏,通过普通中国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用深接地气的方式展现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自信;近年,由王众一牵头策划的原创漫画作品《血与心——日籍解放军战士砂原惠的传奇人生》也取得良好社会效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日本老人砂原惠,他少年时代在东北经历日本战败,报名参加解放军,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他又报名参加志愿军走上朝鲜战场,再后来又为初创的人民空军航空贡献了力量。回到日本后,砂原惠毕生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又如,《人民中国》与出版社合作将张文宏团队编写的疫情防控小册子翻译成日文版,在日本的亚马逊平台销售。这个小册子被在北京的日本人看到了,又联系外文局进行了加印。

“润物细无声的故事、雪中送炭的实用产品是最好的外宣品。”王众一由此得出结论。

### 从单向传播到国际交流合作

自2004年起,我国以中外合作的形式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当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截至2019年,全球162个国家(地区)建立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较为单一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促进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国际语言文化交流与合作,我国在世界语言交流合作中的影响力快速提升。

张博表示,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中,要构建海外本土中文教师培养体系,一方面继续为现有中小学中文教师的进修深造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更加重视高端师资培养,使更多毕业生能进入世界名校,成为培养本土中文教师的“种子教师”,成为推动中文教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孔子学院是中国和世界对话的窗口。”杨朝明说,这些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走出去,传播范围更广了。由孔子研究院和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完成的《孔子这样说》在德语世界引起重视,《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等多个研究成果被翻译成英、日、德、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为海外认识真实的孔子提供了权威读本。

同时,针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亚国家开展国际传播中,非通用语种人才都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一些对外友好界全国政协委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并进行建言,王众一就曾向全国政协提交“在双构建背景下进一步完善非通用语种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储备”的提案。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交流理念。杨朝明建议,要注重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对儒家经典中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进行提炼展示,以加深世界人民对天下为公、民为邦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为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好在哪里,然后看到别人的好东西一起来分享,去寻找共同的文化价值。”王众一也举了个例子,二十四节气源自中国,在日本也有很多歌咏二十四节气的短诗。“我们把这些短诗做成一个栏目,每两周推出一首短诗,寻找一些日本人写的俳句,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形成一个文化栏目。来自中日的原创跟帖非常多。这个栏目已经做了5年了,准备一直做下去。”

事实上,在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流交往中,文化的互鉴和渗透已成常态。据统计,在目前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已收录了20多页类似“卡拉OK、CT、Wi-Fi”这类社会广泛使用的字母词,国内把一些外来词尽量改造成地道的汉语表达形态的原则正在有所改变。

“很多词语我们汉语中原来都有,但是觉得不时髦、不新鲜。20年前,我们不会将‘人气’这个词原封不动就拿过来用,随着流行文化的渗透,中国人说‘人气’也很普遍了。还有‘违和’这个词,倒退5年,可能我们听着还比较‘违和’,现在‘违和’也已经进入到汉语中了。”王众一说,这些语言的流动是通过中外之间的商务、旅游等人员交流以及互联网实现的,体现了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过程。”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其中“文明对话共同行动”和“青年成才共同行动”都是特别需要以语言为桥梁的国际交流合作。党和国家强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擘画,昭示出沟通不同文化的语言桥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2月7日,人们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中阿友好合作交流展上参观。展出的103张照片均来自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的珍贵馆藏资源,生动展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抗击新冠疫情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成果。新华社发

### “我想要更了解中国”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复信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时说,“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你们通过学习中文和参加‘汉语桥’交流项目,了解到丰富多彩、立体全面的中国,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世界各国的文明多姿多彩,要融入其中一窥究竟,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介质。当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如何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又如何通过准确典雅的语言将异域世情民风介绍到国内,增进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了解?这是新时代对外传播不能绕过的话题。



更多报道见  
人民政协报  
微信公众号

### 什么样的语言才易于被接受

不同国度的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语言如同桥梁,促使原本不在同一文化体系之内的人们更顺畅地相互了解。在从事多年对外传播工作的王众一看来,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入“化境”,即通过双方熟悉的语言沟通,由一种文化语境几乎无障碍地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

曾经,活跃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苦思冥想,怎样才能向中国老百姓说明基督教的理念?有一天,他恍然大悟,把“耶稣”两个字写为“爷苏”。大意是,如果你相信这种宗教的话,家里已经去世的祖宗就能重新活过来。这种贴近受众需求和受众思维的策略,可称为本土化传播策略的滥觞。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很注重并擅长运用本土化传播策略,赢得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理解。1954年,新中国外交代表团赴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访问时,为国际友人播放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祝英台》。大使馆工作人员把片名中的两个人名进行了音译,但外国人并不明白这个电影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周恩来总理见状指示,不妨向外国朋友介绍,这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一改,外国人就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

“语言一变通,人类的共同的感情一下子就打通了。”王众一说,在跨文化交流时,经常需要在语言的逻辑上进行转换,把自己的东西转换成容易让对方消化和理解的、接地气的语言,如果直接按字面意义去翻译,反而可能导致阅读或理解上的偏差。例如,“白衣执甲”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是穿着白衣又手里拿着防护设备的一个画面。如果直译,国外的受众往往不知所云。最后在翻译中处理为“以白衣为铠甲”。而“最美逆行者”的翻译则更难一些。“中文理解毫无问题,可直接译成外文就好像在说,疫区的人都在往外跑的时候,医务人员知难而上逆行救援。但疫区里的人是不能随便出来的,在抗疫的语境下‘逆行’是虚指,翻译时必须补上这个逻辑上的漏洞。”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授张博更关注国际学生进行中文教学时的语言转换。长期以来,在与国内外中文教师和留学生的接触中,张博感受到,由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发展逻辑缺乏了解,有的外国学生在中文学习中经常听不懂。“这就需要教师以国际学生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素材、多叙述主体和对话性语态引导他们对中国好故事有共享、有共鸣、有对话,从而主动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认识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同时,张博认为,我国的国际传播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宣介性,不利于传播实效的提升。去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主题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